

# 伟大教育家司徒赞光辉历程 上

## ~~巴中首任校长为华教重大贡献

### 印尼最有影响的 华侨中学之一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印尼华侨欢欣鼓舞。当时父亲与杨新容、张國基、洪渊源、麦爵媗、刘金端、黄周規等发起成立由杨新容担任主席的「促进中印(尼)建交工作委员会」。次年五月，中国与印尼建交，八月份「工作委员会」随之改名称「雅加达华侨团结促进会」。

我的父亲司徒赞，字子襄，广东开平人，1900年9月12日出生于中国农村。八岁丧父，与祖母、母亲及妹妹四人相依为命，家庭生活困难，全靠母亲撑持。半年后，其叔父从马来亚回乡探亲，支助他在本村读了三年私塾。11岁时，跟随乡亲到马来亚谋生。由于年纪尚幼，聪颖好

学，叔父就送他到新开办的中华学校读书，下午则到华英书院学英文。十五岁小学毕业后，他叔父要他留下学木工，但我父亲却执意要回国升学，后得热心校董资助，回国到上海读书。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考进南京暨南学堂师范科。1919年毕业后经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推荐，到中爪哇文池兰(Muntilan)中华学校任校长，从此开始了在海外长达40年的教学生涯。

我父亲在文池兰中华学校主持了两年校政，并抽空编写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处女作《南洋荷属东印度地理》于1922年由暨南学堂出版，黄炎培荐此书写了封面并题词「中和一致」，表示支持和鼓励。此书出版后，各地华校普遍采用作为地理课本。

1922年1月，我父亲应聘到八帝贡中华学校（即八华）任中学语文教师，因学校闹风潮，四个月後辞职到苏门答腊巨港任华商会驻会坐办，按巨港广东同乡的要求，创办华侨学校。1923年6月，我母亲劉金瑞毕业于新加坡南洋



司徒贊先生

女子中学，应聘前往该校任职，由于志同道合两人於1924年11月结为夫妻。

1925年底，我父亲回国省亲，结识了比他小十岁的司徒蕙敏。当时国共合作，经彭泽民介绍，我父亲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。
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我父亲再没参加国民党的活动，在海外一直以无党派的身份从事华侨教育和社团活动。在我父亲的支持帮助下，1928年司徒蕙敏东渡日本留学，从事电影和无线电研究。1987年初司徒蕙敏出差到广州，谈起往事对我說：“你父亲是我的引路人。”

1926年4月，经著名侨领洪渊源介绍任八華校长。1927年1月赴中爪哇三馬旺任荷印华侨学务总会主席。1928年回到巴城出任《工商时报》主编。1929年前往巨港任丹戎厄林爱华学校校长达三年。1931年「九一

八」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侵佔东三省，妄图灭亡全中国。

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迫切要求。这时我父母为出生不久的四兒取名奋生，渴望全国团结抗战奋力救亡，这也是我们五兄弟中唯一以地名取名的一个。

1932年3月，我父亲到新加坡创办《新僑周報》，认识了年仅十九岁的青年画家李曼峰。不久我父亲回到巴城任《時報》主编，随即邀请李曼峰到巴城，给了他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，被誉为「千里

马」遇「伯乐」。在海外传为佳話。他们虽相差十三岁，仍以兄弟相称。但他们到了晚年的书信往来中，李曼峰卻改称我父亲为「恩師」，以表达他感激之情。我父亲去世后，他专为我父亲画了肖像画以沉痛悼念他的挚友。我母亲定居香港，李曼峰夫妇专程看望我母亲，并赠送一幅雄鸡油画留作纪念。

1933年4月，我父母重返文池兰中华学校，直到1935年7月应聘任巴城广仁学校校长，才结束东奔西走的奔波生活，并以巴城为基地，从事侨教和侨团工作。在繁忙的工作中，他抽空编写了《中日游记》（印尼文版，1935年新报出

版）及《爪哇故事童话集》（1937年上海书局出版）。

1937年「七七事变」（又称卢沟桥事变）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，海外华侨豪情激愤，同仇敌忾。我父母积极投身于华侨支援祖国抗日运动。同年8月2日巴城成立「巴里亚华船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」，向华侨筹款及捐赠物资以支援祖国抗日战争，我父亲被选为文书主任，参与起草所有文件的工作。我母亲被选妇女组副主任。我父母还积极发动各华校师生利用时间向家长及侨胞筹款募捐。在父母的影响下，我们兄弟也拿起钱箱，走上街头募捐。此外，由柯全寿医生、洪渊源和我父亲等负责的「特别组织委员会」也购买急救药品和救护车，组织医疗人员和汽车司机一百多人回国服务。直至1942年12月为止，共筹得五千万港元及各类物资。先后寄到贵阳紅十字会收转。

从1937年起我父亲连任巴城华校教师公会主席，同时还担任广肇会馆副主席兼文书主任中华总会文书主任、新明会和养生院顾问，成为印尼著名的华侨教育家和社会活东家之一。1938年我父亲因领导抗日救亡活动，无理地被荷印殖民政府逮捕，但



巴城中学初办时校园